

WAIGUO ZHEXUE · 24 ·

外 国 哲 学

第二十四辑

商務印書館

外 国 哲 学

第 二 十 四 辑

(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华诞纪念专辑)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哲学. 第 24 辑/赵敦华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9323 - 1

I. ①外… II. ①赵… III. ①哲学—国外—丛刊
IV. ①B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71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外 国 哲 学

第二十四辑

(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华诞纪念专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323 - 1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1/4}

定价: 30.00 元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协办：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编 辑 委 员 会

主编：赵敦华

执行主编：杜丽燕

学 术 委 员 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卞崇道(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程炼(武汉大学)
邓晓芒(武汉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杜丽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冯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傅有德(山东大学)	韩林合(北京大学)
韩水法(北京大学)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
贾泽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怡(北京师范大学)
靳希平(北京大学)	刘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尚新建(北京大学)
唐热风(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永平(北京大学)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	徐向东(北京大学)
王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姚卫群(北京大学)
翟振明(中山大学)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
张志林(中山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卷 首 语

《外国哲学》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新传统,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从第十五辑开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外国哲学》的组稿、编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国哲学》稿件的学术水准,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批判性评论、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不吝赐稿,把《外国哲学》办成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外国哲学》编辑部

2002年4月

目 录

执行主编的话	1
西学东渐	5
靳希平 沈有鼎与现象学在中国的引入	7
胡 军 实验主义视野中的国故整理 ——胡适的解读及其误用	38
郝 苑 论洪谦的科学世界概念	66
西学东渐的大师们	89
编者按	91
王玉峰 陈康：中国希腊哲学研究第一人	93
任蜜林 冯友兰：从东西到古今	100
朱清华 贺麟：“新心学”的创造者	105
郝 苑 洪谦：“逻辑冰峰”之上的隐者	110
蒋丽梅 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5
张立英 金岳霖：逻辑，我觉得它好玩	119
高海波 梁漱溟：向西走还是向东走？	124
王玉峰 齐良骥：一生徜徉在康德哲学中	133
裘江杰 沈有鼎：心无旁骛，凌空蹈虚	138
李祥俊 熊十力：会通辨异，融铸儒佛	142
任蜜林 汤用彤：昌明国故，融化新知	147
王玉峰 王太庆：“爱智者”	152
高海波 张岱年：天地之间人为贵	158
李兆勇 张颐：黑格尔哲学东渐第一人	166

2 外 国 哲 学

杨 震 朱光潜：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美学的桥梁	173
青年之窗	181
施 璇 “重力”的概念：笛卡尔与伊丽莎白的 通信中的一项困难	183
蒋 薇 析取主义应该如何处理错觉？	205
新书点评	219
刘 哲 别了！海德格尔：追寻主体的生命 ——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状况	221

执行主编的话

到 2012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走过百年。在学术的脉动中,倾听哲学系百年的历史节奏,构成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学术历程,西学东渐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通常认为“西学东渐”就是西方学术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对于哲学而言,我更愿意用赵敦华教授的表述:西学东渐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①目的并不完全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启蒙,以期让中华民族迅速崛起。

19 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翻开了最屈辱的一页。国人看到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关闭了几千年的大门,深感中国传统的长矛弓箭、木牛流马、万里长城,已经无法保一方国土平安,于是把目光转向西方。

^②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南方和沿海一些城市开设机器局、造船厂、兵工厂等,并且用重金聘请西方技师。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作“洋务运动”,目的是借西方科技,充实中国军事力量。然而,中法之战和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海战,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失败固然是痛苦的,却也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挽救中国,皆因清廷腐败,要想使中国富强,必须改制。

^① 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代前言”,第 1 页。

^② 从这一段“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取自尚新建:《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前言)一书,经他同意,将前言前 5 段全文拿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段文字与我想要表述的内容相吻合,我自己重新写这一部分内容,未见得比这段文字好,且时间有限,来不及做这方面的研究和阐释,故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特此说明。

从 1898 年“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改制成为现实。民国的建立是比着西方的葫芦，画了一个中国瓢。胡适在“归国杂感”中描述过这样一件事。胡适归国后回到上海，朋友拉他去看大舞台戏。看完戏后朋友对他说，“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是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 20 年前的旧古董……你看这 20 年前的旧古董，在 20 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 20 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 20 年前的旧手脚！这岂不是一幅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①

胡适友人所言，无非说，改制的成功并不意味这个制度的基础已经彻底挖掉了。人还是那些人，思想还是那样的思想，支撑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文化基础依然存在。张勋不是在指日间就复辟了吗？尽管这场复辟没有持续多久，却使中国知识分子痛切地感到，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何等牢固！周作人曾经说：“复辟这出把戏，前后不到两个星期便收场了，但是它却留下很大的影响，在以后的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是关系极大的。”^②政治方面的影响是直接导致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而在文化上则引发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影响而发生而兴旺的。”^③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批判封建文化，开启民智，让新人在新舞台上唱新戏。当时的学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④在他们看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文化，批判旧道德，批判旧体制、批判旧政府，等等，都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⑤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对一切传统的东西进行普遍怀疑。既然旧价

^① 胡适：“归国杂感”，见《胡适文存》，第一卷，黄山书社，1996，第 448—449 页。

^② 周作人：“蔡子民”，见《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出版社，1997，第 130 页。

^③ 同上。

^④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第一卷，黄山书社，1996，第 528 页。

^⑤ 同上。

值要受到普遍怀疑,那么我们依据什么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呢?学者们再一次把目光指向西方。这就是20世纪中国的西学东渐过程。西学东渐与洋务运动的差异在于,洋务运动旨在强兵,而西学东渐则在于开启民智,塑造新人,从根本上解决富国利民的问题。一时间,远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到正在西方盛行的种种思潮,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素的逻辑实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等。这些西方思想如潮水般地涌入党。当时的一些热门刊物,如《东方》、《民铎》、《新青年》、《学习》等杂志,或辟专栏讨论西学,或出专号吸引国人视线。本世纪初,西学在中国颇风光了一阵,而且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大规模相遇。用中国文化的眼光、中国文化的方式将西方哲学请进来的,正是那些著名的大师们。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本期《外国哲学》为纪念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华诞专辑,主要围绕大师们展开。栏目之一,西学东渐的大师们,选择曾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已故、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师们,让青年学人探讨他们的生活足迹,他们对于西学东渐的重要贡献,他们的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学术传承本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前提,却不知为何,近年来这样的传承日见式微。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重提西学东渐,回顾大师们的治学风采和思想特征,也是为了薪火相传,促进哲学学科的发展。栏目之二,是现在依旧在哲学系执教的著名教授探讨大师思想的文章。两类文章放在一起,前者清新活泼,却稍显稚嫩;后者沉雄厚重,笔触老到。希望读者喜欢。

谨将本辑献给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华诞!

2012年6月18日

西 学 东 漸

沈有鼎与现象学在中国的引入

靳希平

内容提要: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沈有鼎先生以我国著名逻辑学家享誉海内外，实际上，他是第一个聆听海德格尔讲课的中国人，但终生对海德格尔未置一词。他是第一个直接向学胡塞尔于德国的弗赖堡，回国后第一个教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吸收胡塞尔思想修改、发展自己早已形成的意义理论的中国学者。他是将欧洲的胡塞尔现象学引入汉语界的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关键词:表达 符号 意义 胡塞
尔 现象学 意念 意指
对象 对象本身

—

沈 有鼎，字公武，他于 1908 年生于上海，192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从金岳霖

学习期间，曾建议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①毕业后公费留美。1931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 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1934 年回国，在清华哲学系任教。1945—1948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研究，回国后仍在清华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5 年调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直至 1989 年逝世。在中国学术界，沈有鼎是以中国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著称，是中国早期分析哲学思潮的代表之一。他的“论真理的分野”一文被视为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被

^① 见胡军：《道与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 页：1926 年“金岳霖先生接受了学生沈有鼎的建议，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任主任”。

收入《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① 1984 年左右我曾经拜读过他的论公孙龙子的文章及《墨经逻辑学》，对先生贯通中西的学问十分敬仰。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与现象学有什么瓜葛。2002 年由于偶然的机会，翻阅先生的弟子收集、编纂的《沈有鼎文集》，以及附在文集最后的沈有鼎“文革”结束后致他的学生、国际知名逻辑学家王浩的通信。我在文集中惊奇地发现，沈有鼎同胡塞尔居然有过直接的交往，并且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工作的影响。

谈到现象学引入中国，热爱现象学的同仁都会提及 1929 年发表于《民铎》十卷一号上的杨人梗介绍现象学的文章：“现象学概论”。该文后来收在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哲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二册)》，即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一)》第 133—137 页。^② 杨人梗的文章是如今能见到的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最早的中文综述。但是关于杨人梗，大家所知道的也仅仅是这篇文章。在韩水法先生协助下，我查到了一些杨人梗先生的资料。

综合这些资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杨人梗曾主修英国文学，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亦精通德文，曾从德文翻译了茨威格写的《罗曼·罗兰传》，由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出版。北京解放前夕，傅作义在同社会名流商讨和平解放问题时，杨人梗先生名列其中。^③ 但是目前所见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说明杨人梗是哲学家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该文可能是依据英、德文介绍性文献编译而成。

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以后，也有人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及胡塞尔的思想，比如张东荪、贺麟等，^④ 但是并未引起哲学爱好者

^① 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11—322 页。

^② 张祥龙与杜小真、黄应泉合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其中张对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开端论述甚详。经作者同意，将有关章节作为附录附于文后，供本文读者参考。

^③ 但有一条消息说：“武汉大学教授杨人梗于 1944 年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云云。”不知是否同一人，还是重名重姓，有待以后查证。关于杨人梗的材料，见附录 2。

^④ 详见附录 1。

的真正注意。现象学在中国的真正开端是 20 世纪 40 年代熊伟先生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引入。解放后则有罗克汀先生 60—70 年代用马克思主义对现象学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起码使得当时大陆十分闭塞的学术界,听到了现象学这个名号,引起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年轻人的好奇。当然在台湾有李贵良先生 1963 年出版的专著《胡塞尔现象学》。听台湾现象学家蔡铮云先生介绍,李贵良是从美国天主教 Duquesne 大学毕业,后任牧师。所有这些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早期倡导者,似乎没有谁亲身聆听过胡塞尔本人的教诲。真正有幸聆听过胡塞尔的言传,后来又用胡塞尔的思想做哲学研究工作的却另其有人,而且早于熊伟先生。他就是以数理逻辑学家享誉国内学术界的、鼎鼎大名的沈有鼎。

1931—1934 年沈有鼎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这是介绍沈有鼎生平的材料里都有记录的。^① 关于沈有鼎在德国的学术活动的情况,我只见到熊伟先生在《熊伟自传》中有记录:他回忆 1933 年留德之初的经历时说,“在

弗赖堡的头一年,由沈有鼎和我一同听海德格尔的课,因尚有语言隔阂,我没有能力与沈展开讨论。沈没有语言隔阂,虽然我们曾海阔天空谈论过古今中外的哲学,他却一次也没有谈过海德格尔,第二年沈即回国。”^② 30 年代的海德格尔,在德国如日中天,德国青年趋之若鹜,奉为大师。尽管沈有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发现哪怕是只言片语能够证明,沈有鼎在什么地方提及过海德格尔。可见,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意图没有引起年轻的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的任何兴趣。^③

与此相反,沈有鼎留德期间同已经退休、渐受冷落的犹太哲学家

^① 见《沈有鼎文集》,第 1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II,第 777 页。

^② 见《熊伟文集——自由的真谛》,第 384 页,1997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该书中还提及张颐先生 1935 年休假,去德国探望学生时“拜访了国际大师胡塞尔教授”。

^③ 沈有鼎的弟子刘培育先生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的人民书城——学者风采栏目中发表的署名文章“沈有鼎:著名数理逻辑学家”中云:沈有鼎曾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研究”,只此一句话,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胡塞尔反倒有直接的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工作进行的研究。现在的文献证据就是沈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美籍华裔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文字材料。关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关系,在王浩的文字中直接得到证实的只是,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胡塞尔有过直接的交往。关于这种交往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到底沈有鼎研究了胡塞尔的哪些书,我们至今未能发现直接的材料。他是否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王浩保留的沈有鼎的书信中,可以证明,他曾同胡塞尔就他的现象学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比如,1974年8月11日沈有鼎给王浩的信中谈到现象学的文献时,沈有鼎写道:“不过,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①,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之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②1931年到1934年胡塞尔已经不在大学授课。所以,这条材料证明,沈有鼎在弗赖

堡期间同退休的胡塞尔有过私人往来。胡塞尔很可能在家中接待过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交往到底有多深。另外,王浩在发表沈有鼎的信件时回忆道:“1942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③可见沈有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开过讨论胡塞尔思想的课程。

沈有鼎一生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现象学家。除了沈有鼎在南联大时的学生王浩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沈有鼎曾经在弗赖堡从胡塞尔学习并同胡塞尔本人有过私人交往。沈有鼎也从来没有写过介绍胡塞尔思想的文章。他生前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逻辑著作。但是,仔细阅读沈有鼎的早期工作,可以明显地看出,沈有鼎在这些研究中利用了胡塞尔《逻辑研

^① 黑体为笔者加的。——靳希平

^② 见《沈有鼎文集》,第539—541页。

^③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1页。